

# 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建构与争论<sup>\*</sup>

李 格 琴

**提 要** | 社会心理学视阈的本体安全研究,通过挖掘个体存在于社会的心理需求来揭示自我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国际政治学家由破到立,通过参与哥本哈根论战、对比传统国际安全研究框架以及重新阐释国家之间的安全冲突与合作,试图建构以“国家追求本体安全”为假设的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这种理论假设引起了其内部有关是国家还是个人的主体争论。本文认为,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研究主体可以统一在“社会世界”本体论假设的不同研究系统中。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具有理论与实证的创新价值,但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 安全理论 自我认同 基本信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 | D0

**作者信息** | 女,1977年生,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430073。

社会心理学视阈的本体安全研究是有关自我与他者以及与周遭客体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它从本体论意义上追溯了社会规范与自我认同存在并产生影响的心理根源,揭示了个体自我认同与本体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学者将本体安全概念引入国际安全研究,成为运用社会心理学探索包括安全两难、民族主义、地区认同、移民、宗教极端主义、人道主义等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的新视角。本文旨在梳理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建构过程,评价与化解有关行为主体层次的争论。

## 一、社会心理学视阈中的“本体安全”

1991年,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出版。该书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了现代

社会自我认同机制的出现与影响。研究认同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在少数,但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最大的特色是充分强调个体(agency)的自我能动性,利用埃里克松(Erik Erikson)等学者的心理分析方法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有关存在性问题的困惑,并阐述了个人如何通过心理机制与实践意识减弱存在性焦虑,获得基本信任。在建构自我认同机制的论述中,吉登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揭示认同与安全之间新型的内在关联。那么,在社会心理学视阈中,本体安全拥有怎样的内涵,它又具备怎样的属性特征?

其一,本体安全是个人抵御存在性焦虑

<sup>\*</sup> 本文是2009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istential anxiety)与社会不确定性的一种心理需求与条件,是社会个人最基本的安全感,即个体对社会、他者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

吉登斯认为,个体来到现实世界,为了能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并有效行动,必须将这种存在性焦虑与不确定感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而这就需要建立与维持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即对社会与他人的基本信任。吉登斯指出,“获得这样的信任对于个体保持心理上的存在感与避免存在性焦虑是必需的条件”;<sup>①</sup>而“信任,是人们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是一种保护,抗拒未来的威胁与风险……信任使个体在面对让人消沉的境遇时还能拥有希望与勇气”。<sup>②</sup>

其二,个体的本体安全需要借助日常生活的仪式与惯例(routines)获得,并以保持自我连续性存在、正常融入各种社会关系即形成“自我认同”为特征。

个体超越社会危机、风险环境的本体安全感由谁创造?吉登斯仍从婴儿的早期经验展开论证。他指出,很小的儿童并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个正在走向存在的“存在者”。婴儿必须借助由看护者提供的抚养环境才能被“唤入存在之中”。于是,在与看护者持续的互动中,婴儿逐渐明白“即使看护者暂时不在,自己也不会被遗弃”的惯例,这种日常训练有助于为生存建立“成型的框架”。可见,在婴儿与看护者之间关系的锤炼过程中,习惯与惯例扮演着基本的角色。而在个体的后期活动中,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之间的核心联结得以建立。由此吉登斯提出,习惯与惯例的保持是抵御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焦虑、信任和日常惯例如此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日常生活的仪式理解为应对(本体不安全)的机制。<sup>③</sup>

从吉登斯的论述我们基本可以界定本体性安全的内涵与属性特征。本体安全实质上是一个“自我”存在与认同的安全,常常需要

通过个体融入各种社会关系的自信与行动来体现。自我并非个体本身,而是个体感知到自身连续性存在的一种表达。而自我认同则表现为“为了获得和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心理追寻与观念”。<sup>④</sup>因此,在本体上感觉安全,并非强调身体的安全,而是一种珍视自身连续性的主体性自信与认同。这种本体安全应该同时具有心理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属性。

在心理层面上,以基本信任、自我认同为特征的本体安全,本质上是个体存在于社会、在认知意义上的心理需求,即个人对周遭事物的连续性、秩序性的基本要求。这种基本需求表现为个体对日常社会生活可预期行为的信任感,也是个体反思自我存在与连续性即“自我认同”的前提与动力。这种基于基本信任与自我认同的本体安全,是人类面对现实生活时控制焦虑、抵御无序的心理调适机制,也是个体保持生存希望、勇气与创造性的原始心理动力。

在实践层面上,需要依靠日常生活惯例、程序或规范、习俗来维持的本体安全,并非纯粹的认知与心理上的概念,它也产生于个体与他者、社会环境形成的互动实践。吉登斯十分强调本体安全的实践基础:“自我认同、本体安全得以维持,还要靠日常生活的实践,即一些规范化的社会互动”;“自我认同不是既定的,而必须是日常惯例创造的,由个人自身的行为来持续”。<sup>⑤</sup>

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学视阈中的本体安全,既是一种个体主观性抗拒现实不确定性的认知(认同)心理,又是一个依赖个体参与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3~44页。

② 同上,第44页。

③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1998年,第43页、第51页。

④ 同上,第60页。

⑤ 同上,第40~74页。

互动实践的安全机制,这是一种兼具个体认知意义与社会互动实践双重维度的理论架构,正如吉登斯自己所总结的:“获得本体安全,等于就是在无意识层面与实践层面上去拥有所有人类生活都会有所体现的基本存在性问题的答案。”<sup>①</sup>

## 二、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建构

国际政治学者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本体安全内涵介入国际安全研究始于一场哥本哈根论战。20世纪90年代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开创了国际安全理论所谓“新安全”研究,他们将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从军事防务扩大到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同时将安全研究界限由国家拓展到社会、跨国地区乃至全球。这种新安全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比尔·麦克斯维尼(Bill Mcsweeney)指出了哥本哈根安全研究的不足,并提出需要借鉴社会心理学的本体安全研究来揭示安全的本质内涵。

麦克斯维尼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对研究对象的扩展过于宽泛,不利于国际安全研究的有效性。哥本哈根学派最具特色的理论是“社会安全理论”,即用社会代替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客体,主要探讨社会领域的认同安全。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社会是一个涉及规范、价值和制度的整体,是个不可被还原到个体的结构,而认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主体间构成的社会因素。<sup>②</sup>麦克斯维尼反驳,这种安全研究上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割裂了社会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因为社会认同不是外在于个体的东西,个体也存在“我是谁”这种自我认同的疑问。社会学视阈的本体安全研究就是以个体如何塑造自我认同为中心展开探索,并考察其如何影响到次国家、次社会层面的认同问题。哥本哈根学派过于宽泛地把安全的指涉客体

扩展到超国家、全球层次,却忽视了次国家、次社会层面乃至个体层面认同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这显然不符合冷战后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议题日益交织的特征。<sup>③</sup>

斯蒂尔总结了国家追求本体安全的基本模式:国家是具有社会动机的行为体,除了物质生存也追求以“社会存在”为特征的本体安全。维护这种社会存在需要依附一定的社会惯例,建立自我认同。如果没有日常行为习惯可依附,个体的自我连续性、与他者交往的基本信任体系就无法建立,国家就会感到焦虑;如果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定位与其实际行为不符合,国家也会感到羞耻。斯蒂尔认为,这种本体安全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传统安全框架无法解释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所追求的“道德行为”,例如参与与自身物质生存与利益并不相关的人道主义援助、价值观结盟等。国家追求本体安全模式为国际社会丰富而复杂的国家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路径。

在斯蒂尔研究的基础上,米特森进一步对国家的社会认同与基本信任进行了分类,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理论重新解释国家之间的安全两难与合作。

米特森认为,国家虽然都追求本体安全,即所有国家都会从社会互动中寻找可以依附的惯例来塑造自我认同,但每个国家的认同方式与基本信任的层次、程度却大不相同,对惯例的依附模式也不一样。“有些国家严格、刻板地重复惯例、规则,而其他一些国家

<sup>①</sup> 安东尼·吉登斯,1998年,第52页。

<sup>②</sup> Ole Waever, Barry Buzan, Morten Kelstrup and Pierre Lemaitre (eds.),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Agenda i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 26. 转引自李明明:《社会安全理论探析》,《欧洲研究》2006年第5期,第38页。

<sup>③</sup>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6.

却显得更加灵活”。<sup>①</sup>米特森将国家分为拥有“健康的基本信任”和“不健康的基本信任”两类,并指出,健康的基本信任是国家进行复杂社会学习与拥有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它能够使一些国家通过修正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新的信息,应付复杂的社会变化,并拥有创造新惯例的能力。而缺乏健康基本信任的国家则展现出一种“对已经建立的行为惯例的盲目忠诚”,如果原有惯例被打破,就会引起行为体巨大的焦虑,于是即便有可能损害自身的物质安全,国家也会去维护原有认同的惯例。米特森解释道,之所以如此依附惯例,是因为惯例化的社会关系能够稳定行为体的认同,行为体对它的心理需求甚至可以盲目到不管其认同内容本身。<sup>②</sup>

由于信任类型不同,国家的行为模式也会迥异,而拥有刻板、不健康的基本信任的国家容易依附冲突模式从而形成国际安全新的安全两难。这种安全两难并非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安全两难,而是指在寻求本体安全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因为缺乏学习以及根据新环境调整认同与信任的创新的能力,很容易刻板地重复能够稳定自身基本信任与认同模式的行为惯例,如果冲突能够维护认同,即便这种冲突模式很可能会损害到自身的物质安全,他们也会依附冲突。为了追求与维持本体安全而面临可能的物质安全损害。<sup>③</sup>

国家追求本体安全模式与他们在基本信任与认同类型上的差异不仅可以解释安全两难与冲突,也可以分析安全合作。行为体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赢得本体安全,并不一定要依附冲突。他们对待惯例的态度不一样,行为也就不一样。

### 三、国家还是个人——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研究的主体争论

将国家拟人化处理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传统,米特森与斯蒂尔也沿袭这个方法试图将

本体安全理论借鉴到国际政治领域。然而,将个体的本体安全需求运用到国家身上,引来了不少争论。有学者认为,有关个体的本体安全研究既是吉登斯论证的出发点,也是他思想的归结点,因为最终他探讨的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即使被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以个体作为行为主体展开论证仍要比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更能获得实证支持,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贡献也更大。<sup>④</sup>艾拉纳·克罗利科沃斯基(Alanna Krolkowski)与卡特琳娜·肯瓦尔(Catarina Kinnvall)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研究仍应该以个人为研究主体,为此他们提出了两点原因。

第一,社会心理学视阈中的本体安全理论严重依赖国内环境,而国内环境的特征与国际体系非常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社会特征是个体形成与满足本体安全需要的外在结构要素,而这些要素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克罗利科沃斯基认为,个体需要减少存在性焦虑,必须建立基本信任与自我认同体系,国内社会的秩序化生活、历史传统、民族记忆以及文化价值信仰等都为自我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条件。而国际社会的秩序与共同文化建设,发展到今天也远远不及国内社会,其本质仍未超越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体系。因此,在国际社会的生态结构中,将依附于国内社会环境的个体的本体安全需求推

<sup>①</sup>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 343.

<sup>②</sup> 同上, p. 347。

<sup>③</sup> 同上, p. 361。

<sup>④</sup> Alanna Krolkowski, *State Personhood in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 Sceptical View*,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2008, pp. 109 ~ 133.

演到国家,存在诸多论证的风险。为此,克罗利科沃斯基还分别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次用实例说明本体安全需求运用到国家层面所存在的问题。<sup>①</sup>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化运动使得个体的本体安全追求影响到国际政治领域成为可能。于是,以个体为主体的本体安全研究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肯瓦尔用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民族主义研究来证明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以个体本体安全为基础的理论的迫切性。

肯瓦尔首先论证,全球化浪潮如何增加了个人的本体不安全感: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压缩了原来相互分离的空间与时间,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去领土化”直接影响个人存在的连续性感觉,会加重个人的存在性焦虑,使人变得脆弱、敏感;商品、服务、技术、资本与人员的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城市化、移民潮、高失业率与全球经济竞争,而这些现象带给传统社会诸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变化将持续增加个人的“无根感”(rootlessness);全球化给国家带来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到个体的本体安全感,许多传统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权威性削弱甚至瓦解。旧的社会认同结构正在走向衰落,而新的模式尚未形成,于是社会加速分裂,个体的不确定感与存在性焦虑大大加强。<sup>②</sup>

那么,本体不安全感增加的个体,如何继而国际政治事务产生影响?肯瓦尔认为,作为个体,为了减轻本体不安全感,会用各种方式来寻求稳定的自我认同。而为了迎合这一需要,填补国家在此方面留下的所谓“权威真空”(authority vacuum),许多跨国社会集团活跃起来,声称对个体的安全与福利需求负责,而这其中最具号召力与影响力的是跨国民族与宗教集团。相比地区、职业等其他认同方式,民族与宗教是相对稳定的集体认同形式,他们通常拥有显著的历史沉淀与文化标志。大部分民族都会用选择性的创伤与辉煌的传播来界定自我与他者,区分身份

与认同,而宗教也通常利用文化象征、神话、宣称的真理以及一整套规范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惯例与秩序来聚拢个人的信仰,提供给个人稳定而连续的“身份感”。<sup>③</sup>可见,追求本体安全的个体可以通过依附于跨国社会集团来影响国际事务,而某些社会集团因参与争夺和填补国家影响力空白而使全球社会相较于过去的主权国家体系变得异常复杂。

一些宗教团体谴责政府道德缺失、腐败盛行,号召信徒回归过去,回归基本教义;另一些非国家的民族团体则以维持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以及民族福利等为目标,号召民族自决或分离。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对缺乏本体安全感的个体来说颇具吸引力。但肯瓦尔特别指出,民族或宗教在为个人提供本体安全需求的功能上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通过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宗教主义来增强个人的本体安全可能会损害圈外人的安全,因为这些集体认同通常缺乏宽容性,刻板而不具有审时度势的适应能力,而个人对其的依附反而会降低个人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社会的能力,从而深陷危险。

由此,肯瓦尔认为,运用本体安全理论研究国际安全,最为迫切的是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寻求本体安全的心理动机与民族、宗教在提供个人本体安全需求上的结构功能,继而揭示真正的结构性不安全与藏在某些认同动员背后的权力运作,这些认识无论对于固守极端认同的个人还是主权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肯瓦尔继而指出,国家虽然不作为行为主体来研究,但作为一种为个人提供安全的结构要素,则有必要列入分析框架。

<sup>①</sup> Alanna Krolikowski 2008, pp. 109 ~ 133.

<sup>②</sup> 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2004, pp. 742 ~ 744.

<sup>③</sup> 同上, pp. 756 ~ 758.

#### 四、化解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研究的主体争论

克罗利科沃斯基批判了斯蒂尔、米特森等人试图建立国家本体安全理论有关行为主体假设的不足,而肯瓦尔则系统地阐述了全球化社会中研究个体本体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能的路径和要点。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研究如果要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争论必须予以整合。其实,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研究主体是可以统一在其本体论假设之中的,上述争论可以得到化解。

研究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的学者们并没有专门论述其本体论假设,然而社会心理学视阈的本体安全理论是有明显的本体论倾向的。将个体社会生存的基本需求作为其理论假设,本体安全理论是典型的社会本体论。以社会要素特别是社会规范、认同、社会体制、价值以及社会互动等来解读世界的本源与基质,是社会本体论的核心。而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则将国际社会看作一个主体间性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社会世界是由现象社会学家舒茨首先提出的用来与“自然世界”作对比的概念。他指出,自然世界由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组成,如空气、水、金属等,它们是纯客观的世界。而社会世界由人类组成,是一种主体间性的集体意义的世界。一般来说,社会世界描述了社会生活中思想、信念、知识等人的主体观念客观化(外化)的过程。<sup>①</sup>国际社会是否具有社会世界的特征?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而论,国际社会虽以“无政府”为特征,但并非没有社会世界的社会性特征。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之间具有天生且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他们拥有社会意图和价值观念,并通过大量互动建立旨在塑造有序社会的共享规范与文化。而本体安全这种社会需求正是在大量社会互动、群体制度文化与价值认同共享中得以塑造、延续与变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国家、社会群体,还是个人,都是社会世界中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群体、个人都可以是本体安全需求的主体,他们统一于社会世界。在社会世界中,由人组成的国家面临物质上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当然也在各种社会交往、秩序体制、价值信仰中面临社会存在的困境,也需要解决心理上的自我认同与社会交往上的基本信任问题。各种超国家群体、次国家群体以及个体也都在各自的社会圈乃至全球社会圈中面临本体安全的需要,这是由社会世界的社会性特征所决定的。

因此,学者们所争论的到底是国家追求本体安全还是个人追求本体安全,在国际政治“社会世界”本体论下有了统一的可能,即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遵循社会本体论,将国际社会视为主体间性的社会世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社会群体、个人都具有本体安全的需求。只不过为了研究的可行,我们必要在社会世界的大范围内分出几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系统。

其一,国际层次上,追求本体安全的国家是研究主体,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轨迹、民族文化构成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国际交往经历与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本体认同方式与基本信任类型,这些认同方式与信任类型会相对稳定并直接影响其对外行为模式,继而成为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二,全球层次上,全球化世界中的个人是追求本体安全的主体,他们因全球化的影响增加了本体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国家成为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提供个体本体安全的结构之一,各种社会群体特别是国家、民族、宗教团体因其特定的政治体制、文化积淀以及高度的组织动员性能够吸引个体,国际社会出现国家与非国家群体进行认同竞争的多

<sup>①</sup> 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8页。

元局面。

可见,在不同的研究系统中,国家是作为不同的角色予以研究定位的。不同的研究层次有着不同重点的理论命题,国家是作为主体还是结构主要看实证研究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本体论假设相对灵活,没有陷入主流现实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所谓“物质”与“观念”的本体论之争。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并没有把“观念”因素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将本体安全与国际社会中的物质、权力、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个体与国际社会、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肯瓦尔将个体的本体安全作为出发点,但也试图超越单纯的个体心理需求,去探索社会认同动员与认同竞争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努力揭开社会认同背后反映的权力关系与制度特征。<sup>①</sup>米特森虽然把国家的安全需求分为物质安全需求与本体安全需求,却从未在本体论上将它们对立起来。米特森论证,当国家行为体属于灵活的基本信任与认同类型时,它就容易应付复杂的国际社会变化,适当改变行为模式,协调自身的物质安全与本体安全需求;只有行为体一味固守本体安全需求的行为惯例时,才会发生为了维护本体安全而不惜损害自身物质安全的安全两难。米特森认为,只要认清了这种安全两难的依附动力,安全

两难是可以化解的。<sup>②</sup>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本体论假设以本体安全需求为出发点,但在论证中绝不拒绝探索物质、权力与其他要素的影响,因为它们都是社会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于社会本体论。

在社会世界的本体论假设下,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研究层次得以整合。当然,要形成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还需要提出与论证相对统一的基本变量与逻辑命题。总体而言,社会心理学视域的本体安全研究介入国际政治领域虽然从上世纪末开始,但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的潜力。虽然同属于社会学视角的一部分,但相比我们熟悉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本体安全理论介入国际政治研究充分挖掘了认同、身份与规范的心理根源,既有微观层次的个体能动的心理分析,又涉及社会结构、规范、惯例如何影响个人的宏观探索。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阈相当宽广,研究主体从国家到个体,研究范围从国际到国内,研究内容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恰好符合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现实的特征。为了充分实现这些创新价值,需要继续深化其理论体系研究,加强其实证探索。

(责任编辑:高媛)

※

※

※

<sup>①</sup> Catarina Kinnvall 2004, pp. 745 ~ 746.

<sup>②</sup> 参见 Jennifer Mitzen 2006, pp. 364 ~ 365.